



大会

Distr.: General
3 January 202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25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4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隐而不见：在偏僻、边远和农村地区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

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的报告

概要

在本报告中，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分析了在偏僻、边远和农村地区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处境，重点论及相关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此类人权维护者面临的具体风险和挑战，以及可能加重风险和挑战的交叉身份因素。特别报告员得出的结论包括，阻碍人权维护者工作的许多攻击、威胁以及实际障碍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一. 导言

1. 2023 年 11 月，来自秘鲁亚马逊地区 Santa Rosillo de Yanayacu 的克丘亚土著人权维护者 Quinto Inuma Alvarado 在亚马逊地区圣马丁大区与环境与土地权利维护者举行研讨会后，在乘船返回其偏远社区途中遭到谋杀。¹
2. 据 Quino 的儿子所述，袭击者用树干堵住河道，逼停了 Quino 和其他五人乘坐的船只，此时 Quino 遭到枪击，背部中三枪，头部中一枪。²
3. 25 年来，Quinto Inuma 一直在该地区开展反对伐木者和贩毒者的运动，遇害前多次收到死亡威胁。秘鲁政府对他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这些措施不够充足。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下，多名嫌疑人被控谋杀罪，截至本报告定稿时，其中四人已被羁押候审。³
4. 每年都有数百名人权维护者因代表他人和平开展倡导活动而被杀害。许多人权维护者同 Quinto Inuma 一样，在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工作，面临着特别的危险。特别报告员对许多人权维护者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赞赏。
5. 特别报告员指出，谋杀并不是偏僻、边远和农村地区人权维护者所面临的唯一问题。考虑到部分最有可能受到身体攻击和其他侵犯的人权维护者往往是最边缘化的群体，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⁴中将在偏僻和边远地区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列为了优先事项。她着重指出，据这些人权维护者称，由于他们身处偏远农村地区，政府部门、联合国机制以及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往往会忽视他们。她指出，有些人权维护者在远离国内人权机构和外国使馆保护的情况下开展工作，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她明确表示，她计划将与这些人权维护者接触作为工作的核心内容。
6. 自首次阐明优先事项以来，特别报告员已多次就偏僻、边远和农村地区人权维护者遭受攻击的问题致函各国。她指出，各国并不总是答复涉及这一重要问题的信函，这令她感到些许遗憾和沮丧。事实上，自特别报告员履职以来，她发出的信函有 45% 尚未得到回应。
7. 特别报告员还定期与来自各大洲的偏僻、边远和农村地区人权维护者举行在线会议，并亲自拜访了其中多人。在正式的国别访问或非正式访问期间，她会特别争取与城市以外的人权维护者会面。
8. 她还指出，虽然有些国家尝试保护面临危险的人权维护者，但人权维护者经常向她反馈说，现有的保护机制在理论上优于实践、过于薄弱或资源不足，或者无法满足在偏僻、边远和农村地区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实际需求。

¹ 见 PER 10/2023 号函件。本报告提及的所有函件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² 见 <https://www.cbsnews.com/news/peruvian-rainforest-defender-quinto-inuma-alvarado-killed>。

³ 见 <https://www.forestpeoples.org/en/the-jackals-of-santa-rosillo-murder-of-apu-quinto-inuma> 和 <https://convoca.pe/agenda-propia/quinto-inuma-asi-fue-la-captura-del-presunto-autor-intelectual-del-asesinato-del> (西班牙文)。

⁴ A/75/165。

A. 规范框架

9. 在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工作的人权维护者与一般的人权维护者一样，受到相同人权标准的保护，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各国政府在保护人权维护者方面最相关的人权文件，以及《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人权维护者宣言》)。

10. 一些其他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可能对在偏僻、边远和农村地区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特别重要，包括《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奥胡斯公约》)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关于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法律的区域协定》(《埃斯卡苏协定》)。

11. 特别报告员感到鼓舞的是，倡导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权利的人权维护者日益得到承认，他们往往身处偏远和农村地区。她认为“环境人权维护者”一词涵盖了关注多项议题的广泛个人、组织和非正式运动。她欢迎根据《奥胡斯公约》设立环境维护者问题特别报告员，这是在联合国系统或任何其他政府间机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下设立的首个专门旨在保护环境维护者的国际机制。⁵

12. 她还认可国际和区域法律和标准的重要性，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埃斯卡苏协定》。她指出，这些举措能够产生多大效果，取决于相关方面能否拿出足够强的政治意愿加以落实。

13. 许多土著人权维护者在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开展工作。虽然在土著人民对影响自身权利和领地的项目给予或拒绝给予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许多土著人权维护者报告说，国家未能维护该权利，政府机关和企业常常侵犯或忽视这一权利。⁶

B. 数据和方法

14. 为编写本报告，特别报告员发布了公开征集资料的通知。特别报告员共收到 50 份答复，其中 9 份来自各国政府，33 份来自民间社会组织，5 份来自个体人权维护者，3 份来自学术机构。特别报告员感谢各方为本报告提供资料。

15. 本报告还参考了多位任务负责人自 2020 年 5 月以来发出的相关信函中所载的信息，以及通过组织在线意见听取会从人权维护者处获得的信息(2020 年至 2024 年间共举行 46 场意见听取会，有 400 名人权维护者参加)。报告还收录了特别报告员在 2024 年 11 月于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南部非洲人权维护者峰会以及在阿克拉举行的 2024 年非洲妇女人权维护者大会期间收集的陈述。

⁵ 见 <https://unece.org/env/pp/aarhus-convention/special-rapporteur>。

⁶ 见 <https://www.ohchr.org/en/indigenous-peoples/consultation-and-free-prior-and-informed-consent-fpic>。

C. 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挑战概览

16. 与其身份的其他交叉因素一样，身处农村、边远或偏僻地区可能令人权维护者面临的风险倍增。缺乏支助机制、交通连接、媒体报道、地方警力保障、网络连接和适当的服务提供者，是常有的问题。他们的农村身份也可能引发歧视。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妇女人权维护者指出，她被认为是农村人而非大城市出身，因此遭人轻视。⁷

17. 偏僻、边远和农村地区的人权维护者往往难以被承认为正当的人权行为体，在面对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宣传时往往难以维护自己的信誉。国家和企业行为体有时会利用这种情况，攻击人权维护者的信誉，并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制造紧张关系。一些人权维护者还会面临刑事指控和反公众参与策略性诉讼，但很难前往首都或主要城镇应诉，而此过程往往还伴随着上述的抹黑行动。

18. 许多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的人权维护者无法使用可靠的银行系统，难以收发资金，包括紧急情况下的资金支助。他们还表示无法接入通信系统，包括网络。这种数字鸿沟对许多人权维护者的工作造成了极大阻碍，而法律支助的缺失更是雪上加霜——在偏远地区，法律支助往往难以获得。

19. 在某些案例中，偏远地区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等(LGBTQI+)人权维护者无法公开自己的身份，否则将面临危险。⁸ 他们没有社区的支持，而在他们真正需要帮助时，援助无法及时到位。

20. 少数群体语言使用者往往生活在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权维护者使用的语言与官方认可的语言不同，语言也会成为一大障碍，会限制他们申请资金或传播诉求的机会。此外，人权领域使用的专业术语也可能成为一种阻碍。

21. 对于生活在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且有残疾的人权维护者而言，这些挑战可能更加严峻。在需要远距离出行参加倡导活动或报告侵权行为的情况下，他们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可能无法像生活在城市的残疾人权维护者一样，享有同等水平的必要技术服务。⁹

22. 一些政府频频将人权维护者关押至偏远监狱，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将他们与家人及法律援助网络隔离。

23. 许多农村和偏远地区的人权维护者也往往被隔绝于本国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创造的团结空间之外。有些人权维护者表示，有关部门完全无视他们以及他们提出的关切。¹⁰ 许多人仍然不了解“人权维护者”一词，也未将自己视为人权维护者，因此无法获得原本能够得到的资源和支助。¹¹

⁷ A/78/131, 第 16 段。

⁸ 见多元哥伦比亚提交的材料。另见 <https://www.protectioninternational.org/researchpublications/collective-protection>。本文件提及的所有提交材料均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special-procedures/sr-human-rights-defenders/annual-thematic-reports>。

⁹ 见 <https://srdefenders.org/disability>。

¹⁰ 见 Julio Pereyra 提交的材料。

¹¹ 见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提交的材料。

D. 保护方面的不足

24. 对于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的人权维护者，需要以更为谨慎的方式开展保护工作，包括采取集体保护策略而非个体保护策略。这类人权维护者需要的有效支助不能以首都或主要城镇和城市地区为据点，必须尽可能接近人权维护者生活和工作的地点，以满足实际和紧急的保护需求。¹²

25. 多年来，特别报告员及其前任多次向各国提出这些具体关切，并提醒各国义务保护在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¹³ 然而，人权维护者继续受到攻击，甚至受到来自国家行为体的攻击，这也是特别报告员必须要编写本报告的原因。

二. 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攻击

26. 特别报告员时常听闻在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所受的威胁以及他们被针对、被指控和被攻击的具体方式，而其原因往往出于他们的身份以及所从事的工作。年复一年，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

27. 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报告称，2023 年有 196 名土地和环境维护者遇害，遇害者通常在农村、偏僻或边远地区开展工作。¹⁴ 《前线卫士 2023/2024 年全球分析》记录了 2023 年在 28 个国家发生的至少 300 起人权维护者被害事件，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死者是土著人民权利维护者。在一项关于 2020 年至 2024 年间人权维护者所受攻击的研究中，前线组织：保护人权维护者国际基金会(前线卫士)记录了 389 起针对该组织所归类的农村人权维护者的攻击事件，包括逮捕、威胁、身体攻击和杀害事件，占总共记录的 5,982 起攻击事件的约 7%。¹⁵ 特别报告员指出，这些数字突出表明，在收集有关偏僻、边远、农村和基层人权维护者所受攻击的数据方面存在挑战。

28. 本报告无法一一列举特别报告员履职近五年来与各国政府沟通的涉及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人权维护者的所有案件，但提供了一些能够反映更多类似情况的代表性案例。

29. 2024 年 11 月，特别报告员就 Antônio Francisco de Sousa Araújo 一案¹⁶ 致函沟通，Antônio Francisco de Sousa Araújo 是一名人权维护者，来自偏远的 Vergel 社区，该社区距离巴西马拉尼昂州科多镇 51 公里。长期以来，他一直开展活动，反对农民和伐木者侵占他所在社区土地的行为。自 2007 年以来，他有四名家人被谋杀，其中包括他的兄弟，于 2021 年遇害。杀人者仍然逍遥法外。在他家人的人权遭受严重侵犯的情况下，这位人权维护者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

¹² 见前线组织：保护人权维护者国际基金会(前线卫士)提交的材料。

¹³ A/70/217, 第 96(e)段；A/71/281, 第 102(g)段；A/74/159, 第 147(d)段；A/75/165, 第 91(f)段。

¹⁴ 见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environmental-activists/missing-voices>。

¹⁵ 见 <https://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resource-publication/global-analysis-202324> 和前线卫士的邮件。

¹⁶ 见 BRA 6/2024 号函件。

30.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Antônio Francisco de Sousa Araújo 曾于 2023 年 7 月申请加入国家人权维护者保护方案，但遭拒绝。2024 年 10 月，有一名武装男子试图闯入他家，他和家人在家中躲藏；几天后，又有人试图闯入，据称是同一名男子所为。在这次攻击事件发生之后，他才被列入保护方案。

31. 在许多案例中，农村地区人权维护者遭受攻击的事件仍然没有得到调查和起诉。根据一个组织的说法，执法机构往往缺乏调查能力或意愿，而且大多数农村地区交通不便，还缺乏必要的通信手段，如稳定的网络连接和基础设施。¹⁷ 有一个案例充分体现了这种能力不足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在 2024 年 11 月 29 日于阿克拉举办的一场对话塞拉利昂农村地区妇女人权维护者的磋商会上，听到一位妇女人权维护者说，她到警察局报案时，被告知警方没有笔，连铅笔也没有，无法记录报案陈述。

32. 农村人权维护者有时为形势所迫会前往首都和平开展倡导活动，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并不安全。在特别报告员于 2023 年对格鲁吉亚进行国别访问后，有 11 人在第比利斯针对环境保护和农业部举行和平抗议活动时被捕，其中包括多名来自拯救 Rioni 山谷运动的环境维护者和一名记者。¹⁸ 抗议活动针对的是向私人出租 104,712 公顷林地用于狩猎一事。抗议者前往该部，试图与部长会面，希望了解该林地的未来。

33. 对许多农村社区而言，网络接入困难、不稳定且费用高昂，无线电成为了至关重要的连接方式。2024 年，特别报告员就 Abelardo Liz 一案向哥伦比亚主管部门致函沟通。Liz 先生是一名土著记者和人权维护者，隶属于科林托土著理事会的传媒网络。他在为 Nación Nasa Estéreo 广播电台报道一场土地权抗议活动时，被哥伦比亚武装部队成员杀害。¹⁹

34. ALL RISE 气候与环境正义律师组织是一个由女性领导的法律中心，设于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该中心与直接受影响社区合作，包括自 2018 年 11 月以来代表 Mfolozi 社区就 Somkhele 煤矿扩建一事提起诉讼。2020 年 10 月，Mfolozi 社区环境正义组织前副主席 Fikile Ntshangase 被暗杀。特别报告员已就 Ntshangase 女士被害一事向南非政府致函沟通。²⁰ 遗憾的是，她至今尚未收到答复。在 2024 年 11 月 25 日和 26 日于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南部非洲人权维护者网络峰会期间，特别报告员在一次会外磋商会中从 Ntshangase 女士的女儿处获悉，她继续收到与她母亲案件相关的威胁。

三. 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的妇女和 LGBTQI+ 人权维护者

35. 一些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的人权维护者还会因为性别成为攻击目标，他们被攻击的原因不仅在于所从事的工作，还在于他们的身份。这种情况尤见于在农村地区坚持发声、争取关注的妇女和女童，农村地区往往期望女性遵循传统、留在私人领域。在 2024 年 11 月 28 日于阿克拉与人权维护者的磋商会中，一位加

¹⁷ 见索马里人权维护者联盟提交的材料。

¹⁸ [A/HRC/55/50/Add.2](#), 第 68 和第 69 段。

¹⁹ 见 COL 1/2024 号函件。

²⁰ 见 ZAF 3/2020 和 ZAF 4/2023 号函件。

纳的妇女人权维护者提到，在该国北部的农村地区，妇女通常被要求在男子在场的场合保持沉默，有志从事人权工作的年轻妇女不得不与家人疏远，因为争取妇女权利的她们已为传统所不容。

36. 在偏远地区为他人争取权利的女性往往孤立无援。由于主流社会和文化规范的限制，她们很难获得支持，尤其在所涉及议题棘手或不受欢迎的情况下。

37. 特别报告员 2023 年的报告《和平之路：冲突、冲突后和受危机影响环境中的妇女人权维护者》所征集的资料提到，农村地区妇女人权维护者遭受性别暴力的现象严重。²¹ 当这种暴力发生时，支助服务往往缺位，而追究责任的希望渺茫，因为许多农村地区没有专门处理性别案件的检察官来处理妇女人权维护者或她们协助的妇女报告的案件。²² 此外，如肯尼亚的土著妇女 Jane Meriwas 在 2024 年 11 月 28 日于阿克拉举行的磋商会上所指出，妇女人权维护者向警方报告农村地区的性别暴力时，是否记录报案陈述取决于个体警员的态度。对于此类情形，警方通常的反应是将性别暴力简单归类为“家庭问题”。

38. 塞拉利昂妇女人权维护者报告了大量的性别暴力行为，包括强迫婚姻、强迫卖淫、强奸、经济剥削、家庭暴力和切割女性生殖器。非洲女矿工联盟的合作伙伴塞拉利昂采矿和采掘业妇女组织一直与凯内马区通戈金刚石矿区以及该国其他农村地区的女性强奸幸存者合作。这些妇女如今也成为了人权维护者，帮助其他遭受强奸的妇女寻求正义。

39. 塞拉利昂警方的家庭支助部门是性别暴力和虐待受害者的主要对接机关，负责调查案件并为受害者提供支助。然而，该单位缺乏足够资源，妇女人权维护者报告称，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单位会以调查名义向受害者索取经济支助，特别是在偏远和难以到达的社区。例如，在通戈金刚石矿区发生的一起案件中，一名女性强奸受害者因无法支付该单位要求的费用，不得不放弃案件——她本人和她的支持者都无法承担这笔费用。²³

40. 在为本报告开展的磋商会中，特别报告员多次听到妇女人权维护者提到，传统价值观、习俗和信仰在农村地区更加根深蒂固，因此，相较于城市，在农村地区为少数群体争取权利的妇女人权维护者会面临更大的歧视。例如，在尼泊尔，一家设立于农村地区、支持当地达利特社区的妇女权利组织遭其办公大楼的房东攻击。²⁴

41. 2024 年 5 月，该房东据称进入该组织的办公室，暴力将其设备扔出，以此反对该组织招聘达利特员工的做法。房东的妻子还辱骂了工作人员，威胁要诬蔑他们“不洁”，并要求禁止该名达利特员工进入该建筑。他们还威胁要提高租金，并强迫工作人员立即离开该建筑。²⁵

42. 2024 年 6 月，该组织由于担心自身安全，计划迁走办公室，而警方介入后，为这些妇女人权维护者争取到了罕见的积极结果。警方将房东及其妻子带到该社

²¹ A/78/131, 第 71 段。

²² 同上，第 72 段。

²³ 同上。

²⁴ 见 NPL 3/2024 号函件。

²⁵ 同上。

区进行公开道歉并请求谅解，以非正式方式了结了此案。此后，尼泊尔警方开始使用扩音器，向整个社区广播反对种姓歧视的信息。²⁶

43. 在同一省的其他地方，有五名年轻男子袭击了一个由妇女人权维护者设立的中心。该中心旨在为遭遇火灾的无地社区提供紧急援助。在此事件中，警方同样进行了介入，同时介入的还有当地社区成员。针对所收到的强奸威胁，妇女人权维护者希望以性骚扰的案由登记，但警方却建议依据 2017 年《国家刑法》第 118 条，以“行为不当”的案由登记。警方还表示他们有更重要的优先事项要处理，这让人权维护者们更为忧虑。²⁷

44. Zehida Bihorac 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名妇女人权维护者和教师。自 2018 年起，她开始为靠近克罗地亚边境、自己偏远家乡大克拉杜沙周边的难民和移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20 年，警方拍摄到她探访难民营的画面并指控她协助非法移民，此后，对她的网络攻击愈演愈烈。有人创建了 Facebook 群组，对她进行性污蔑，说她是“道德败坏的女人”，不适合教书，还详细描述了要如何杀死难民及帮助他们的人，同时威胁要对提供援助的人实施人身暴力。她向当地警察局报案，投诉这些言论的发布者，但未得到任何处理。她还曾在驾车时遭到数名男子尾随并被其中一人暴力威胁，她随后也报了警。但当她后来返回警察局询问案件进展时，警方却告诉她，当时值班的警员愿意听她陈述，已经算她走运了。²⁸

45. 在 2024 年 11 月 28 日于阿克拉与 LGBTQI+ 人权维护者进行的一次磋商会上，一位跨性别非二元间性与会者向特别报告员讲述了自己在本国农村地区间性者争取权利时所面临的一些困难。该与会者提到，在奥蒂大区 and 沃尔特大区盛行的文化传统观念和宗教信仰下，间性者受到了普遍的歧视和令人震惊的残酷对待。2021 年，该与会者与另外 20 名 LGBTQI+ 权利维护者因举办关于保护性少数群体人权的法律培训，在沃尔特大区的农村地区遭到逮捕。当时警方和媒体人员根据当地的线报对会议进行了突查，此后，这 21 名人权维护者被控非法集会。²⁹当地社区获知被捕者姓名后反应激烈，其中一名人权维护者的女儿被迫转学。

四. 法律挑战

46. 特别报告员指出，在偏远地区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在使用其合法权利方面面临更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包括律师费用过高、与法院的距离遥远，以及极易惹上难缠的反公众参与策略性诉讼和其他司法骚扰。在偏远地区，很难、甚至无法找到人权律师。特别报告员在 2022 年对希腊进行国别访问时，获悉了同样的涉及移民权利维护者被刑事指控情况的问题。同样，在同年访问塔吉克斯坦期间，特别报告员也了解到该国某些地区律师人数很少甚至不存在。攻击人权维护者的行为普遍不受惩罚已是公认，远离法律援助网络的人权维护者面临的困境尤为严峻。

²⁶ 同上。

²⁷ 同上。

²⁸ 见 BIH 2/2020 号函件。

²⁹ 见 GHA 2/2021 号函件。

47.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有关部门对此类攻击事件普遍应对不力，这在农村和土著社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地区通常是政府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人权维护者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

A. 律师资源的可得性

48. 农村、边远和偏僻地区的人权维护者难以获得律师服务，这令其处境更为脆弱。

49. 例如，人权维护者指出，在俄罗斯联邦，根据一般规则，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必须具备诉讼律师资格。这种资格不仅对刑事诉讼至关重要，对于保护被拘留人权维护者的权利，例如接受医疗护理的权利也同样重要。³⁰

50. 然而，据非政府组织报告，为人权维护者聘请律师不仅非常困难，而且费用昂贵，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俄罗斯联邦各地的律师协会均自定会费，这些费用通常高得惊人。例如，在俄罗斯以偏远地区为主的阿尔泰共和国，律师协会的会费超过 5,000 美元，是当地月最低工资的 20 倍。³¹ 这些费用会转嫁给委托人，抬高法律代表服务的价格。而莫斯科的律师在收入较高的情况下，在获得刑事案件执业资格方面所需的支出反而较低。然而，莫斯科的律师如果没有获得当地律师协会的资格认证，也不得定期前往偏远地区代理委托人权益。

51. 因此，来自偏远地区的律师往往没有机会成为刑事辩护律师，而其中许多人本身也是人权维护者。根据独立人权组织 OVD-Info 的数据，俄罗斯联邦平均每 2,000 人拥有一名律师。但在偏远地区，这一比例要低得多。例如，2023 年，俄罗斯联邦平均每 3,800 人拥有一名律师，而在居民人数约为 42,000 人的涅涅茨自治区，律师却仅有 8 名，即平均每 5,250 人拥有一名律师。³²

52. 为了保护和维护更多偏远地区公民的法律权利，可持续发展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在越南成立，专注于环境保护、土地侵占和工业污染案件的法律辩护工作。该中心制定了多个方案，与当地社区合作，确保相关方面的现行法律得到落实。2021 年 6 月，该中心负责人 Dang Dinh Bach 以涉及外资的逃税罪名被捕，上述方案因此中断。³³ Bach 先生否认了这些指控。2022 年 1 月，他被判处五年监禁。

53. Chanakya 倡议报告称，在美利坚合众国，有关人权维护工作的保护性执法努力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人权维护者依赖的州和地方资源在质量上差异显著。虽然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设有专项方案，为设其境内或在其境内开展工作的组织提供资助和律师服务，但这些方案一般仅存在于城市，而在蒙大拿和北达科他州的农村地区工作的人权维护者也报告称，他们很难获得这种福利。³⁴

³⁰ 见 OVD-Info 提交的材料。

³¹ 同上。

³² 同上。

³³ 见 VNM 2/2022 号函件。

³⁴ 见 Chanakya 倡议提交的材料。

B. 与出庭相关的挑战

54. 在偏远地区工作的人权维护者遭受司法骚扰似乎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这种骚扰包括国家滥用刑法，以及私人实体在公共机构支持下发起反公众参与策略性诉讼。

55. 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权维护者在面临此类刑事指控或诉讼时，通常会在出庭方面遇到若干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在社区附近寻求法律支助的困难、法院与其家乡之间的距离以及往返两地的旅费，这给他们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压力，还导致社区难以陪同出席。由于这些因素的制约，农村权利维护者更加孤立无援。而口译员数量不足，以及缺乏具备土著事务专业知识的公职人员(对土著人权维护者而言)，进一步加剧了被诉的人权维护者孤立无援的状况。³⁵

56. 许多人权维护者强调了国际、区域和国内组织及机构提供支助的重要性，这些组织机构可以联系有关部门并向其施压，确保人权维护者能够诉诸司法。他们指出，反公众参与策略性诉讼和其他形式的骚扰通常只有在上诉至国家或联邦法院时才会引起关注，但在案件初期阶段对地方法官和法院开展倡导工作才是最有效、最有帮助的。此类早期行动不仅能够显著缩短人权维护者应付诉讼的时间，还可能对判决结果产生积极影响。³⁶

C. 反公众参与策略性诉讼

57. 一些人权维护者报告称，一些私营企业(在某些情况下得到了国家机关的支持)会发起反公众参与策略性诉讼，以压制并恐吓和平人权运动的组织者。这种司法骚扰常常导致自我审查，社区在这种恐吓下更难以抵抗试图控制其领地的经济力量，不平等现象也因此加剧。考虑到农村、边远和偏僻地区人权维护者被刑事指控时面临的相关挑战，这种针对性行为对此类人权维护者的打击尤为严重。

58. 2022 年，马来西亚三林集团的两家子公司对设于婆罗洲沙捞越的基层非政府组织拯救河流提起了反公众参与策略性诉讼。该组织与土著社区合作，致力于保护土地、河流和集水区免受环境破坏，维护生物多样性，并帮助土著人民捍卫其权利。相关公司以拯救河流涉嫌发布诽谤性言论对其造成损失和损害为由，要求该组织支付 500 万林吉特(约合 112 万美元)的一般性损害赔偿。这一起诉讼源于拯救河流网站上发布的一系列文章，文章披露了受伐木证授予决定影响的土著社区的关切。文章称，与受影响社区进行的所有协商都没有提供真正的机会，让土著社区能够给予或拒绝给予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³⁷ 在全球声援运动 #StoptheSLAPP 等努力下，相关公司撤回诉讼，拯救河流得以庭外和解。但漫长的法律程序仍然耗尽了该非政府组织本可用于支持其工作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³⁵ 见前线卫士提交的材料。

³⁶ 同上。

³⁷ 见 MYS 2/2022 号函件。

五. 数字鸿沟与网络中断

59. 偏远地区网络服务不足，损害了人权维护者保护他人权利的能力，并增加了他们面临的风险。³⁸ 能否联网及使用联网设备造成的数字鸿沟在偏远地区尤为明显。³⁹ 特别报告员回顾，一位土著妇女人权维护者在特别报告员 2024 年访问巴西时向她强调了这一问题。

60. 对此问题的一个积极响应是，一些政府开放了卫星连接，使人权维护者能够更有效地通信及监测风险。例如，哥伦比亚的人权维护者报告说，有关部门提供了网络连接中心，例如信息亭和数字服务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需求。⁴⁰

61. 然而，鸿沟依然明显。特别报告员与偏远地区的人权维护者进行了许多在线会议，但他们往往需要长途跋涉数小时才能获得网络连接。

62. 网速缓慢、信号频繁中断以及设备陈旧的问题阻碍了人权维护者有效参与民主空间，例如公开听证会和参与进程，而这些活动自冠状病毒病大流行(COVID-19 疫情)后越来越多地转向数字平台。

63. 当地非政府组织报告称，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省西南部农村次区域的土著社区获取数字资源的渠道极其有限，估计仅有 38.8%的家庭能够接入互联网，而城市家庭的比例则为 68%。⁴¹

64. 其他组织指出，在哥伦比亚的一些偏远地区，家庭网络覆盖率不足 24%，网络覆盖率不足所造成的困难又因银行和数字基础设施稀缺而加剧，限制了人权维护者开设银行账户和获得信贷的机会。⁴²

65. 利比亚偏远地区的人权维护者报告称，他们难以获得数字通信服务，并将此问题归咎于基础设施欠缺以及历届政府将这些地区边缘化。他们还报告称，互联网经常被故意关闭。⁴³

66. 2021 年，特别报告员就克伦族土著人权维护者据称在岗卡章森林保护区遭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和植物保护部官员袭击和骚扰一事向泰国政府提出关切。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是，政府将岗卡章森林保护区提名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指定的世界遗产地，相关过程中未与受影响的土著人民协商，也未寻求其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⁴⁴

67. 克伦族社区成员被迫搬离 Upper Bang Kloy 村的传统土地后，于 2021 年 1 月至 2 月逐步返回该地区，但随后遭有关部门施压，被要求返回政府分配的 Lower Bang Kloy 安置地。移动信号和网络信号被切断了数天，限制了社区的通信和组

³⁸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消除数字鸿沟：采取行动实现数字包容(内罗毕，2021 年)，第 15 和第 17 页。

³⁹ 人居署，评估数字鸿沟：了解城市和社区的联网情况和数字素养(内罗毕，2021 年)，第 8 和第 15 页。

⁴⁰ 见安蒂奥基亚省西南部地区 Embera Chamí 保留地和社会思想与行动组织提交的材料。

⁴¹ 同上。

⁴² 见大学反腐败网络提交的材料。

⁴³ 见利比亚犯罪观察提交的材料。

⁴⁴ 见 THA 4/2021 号函件。

织能力。此外，还限制外界向 Upper Bang Kloy 村的社区运送食品。据称，这些限制由国家公园官员实施，目的是迫使村民回到 Lower Bang Kloy 村。⁴⁵

68. 津巴布韦农村教师联合工会表示，当其网络中的人权维护者面临危险时，很难迅速获得支助。该组织指出，大多数支助服务都需要在线申请，这对津巴布韦农村地区的人权维护者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在适当基础设施不足、联网困难以及电力短缺的情况下，他们几乎不可能即时获得支助。⁴⁶

69. 其他人权维护者则表示，使用安全通信应用程序后，能够更便利地协调快速响应和记录事件，但要让这些工具发挥实效，就要保障持续的电力供应。⁴⁷

六. 企业行为及其对偏僻、边远和农村地区人权维护者的影响

70. 特别报告员与许多因声讨偏远地区有害商业项目而成为目标的人权维护者进行了谈话和会面。她经常听到此类处境下的土著人权维护者说，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要么被操控，要么不存在。

71. 人权维护者受到的攻击，有些是企业代理人所为，有些是政府机关与工商企业联手所为，有些是从事经济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所为，还有许多是所有这些行为体联合所为。

A. 不进行协商并报复当地意见表达者

72. 特别报告员经常听到农村人权维护者说，在他们的家园或土地附近进行的项目没有与他们协商。即便开展了协商，也往往是有限制的，只有少数事先选定的领导人参与，人权维护者和大部分社区成员都被排除在外。协商过程中提供的信息往往专业且复杂，社区无法充分获得独立建议，以帮助他们全面了解项目的影响。⁴⁸ 人权维护者如果坚持要求发声，通常会遭到报复。

73. 2023 年 1 月，特别报告员加入了由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牵头的一份信函，就韦特苏伊腾土著人民因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持续受到侵犯和侵害的指称向加拿大政府提出关切。沿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液化天然气管道穿越了韦特苏伊腾土著人民未割让的传统领地，而在决定管道能否从该领地经过的协商进程中，韦特苏伊腾的世袭酋长们据称被排除在外。至少自 2018 年起，韦特苏伊腾人就一直在抗议管道建设，并设立了路障阻止项目继续推进。2019 年 12 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发布禁令，禁止他们进入化石燃料基础设施选定地点，无视这些地点位于土著土地内的情况。禁令由加拿大皇家骑警强硬执行。尽管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其 2019 年的决定中敦促加拿大停止将韦特苏伊腾人强行逐出其土地，但加拿大皇家骑警仍于 2020 年 2 月初⁴⁹ 对韦特苏伊腾营地进行了一系列突袭，据称出动了 100 多名装备半自动步枪并携带警犬的特警。

⁴⁵ 同上。

⁴⁶ 见津巴布韦农村教师联合工会提交的材料。

⁴⁷ 见国际社会责任和人权研究所提交的材料。

⁴⁸ 见安蒂奥基亚省西南部地区 Embera Chamí 保留地在社会思想与行动组织参与下提交的材料。

⁴⁹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 1/100 号决定。

手无寸铁的韦特苏伊腾土地权利维护者及和平支持者被强行带离该领地并被监禁。突袭期间，加拿大皇家骑警从禁令所涉区域外 17 公里处起设立“禁区”，阻止公众进入。世袭酋长、记者和一名议员被禁止进入该区域查看逮捕情况，而非土著人则无需出示证件即可通过封锁线。⁵⁰

74. 自特别报告员就此案向加拿大政府提出关切以来，有数十名韦特苏伊腾土地维护者因涉嫌违反禁令规定而被拘留，并被指控犯有刑事藐视法庭罪。

B. 暴力与刑事指控

75. 反对在其土地上开展采掘项目的人权维护者常常面临暴力，而国家机关散布的言论往往会加剧这种暴力。这些言论对人权维护者进行污名化并指控其犯罪，将其定性为犯罪集团成员。这种策略经常被用来制造军事干预的借口。

76. 2023 年 5 月，特别报告员就利比里亚国家警察袭击与邦县 Kokoya 社区合作的环境和土著人权维护者一事向利比里亚政府致函沟通。当地人权维护者一直要求对利比里亚 MNG 金矿公司 2017 年泄漏有毒物质事件追究责任，当时该公司位于邦县 Kokoya 金矿的尾矿储存设施泄漏了 300 万加仑有毒化学品，包括氰化物、汞和铅。⁵¹

77. 面对要求追责的抗议活动，该国以武装抢劫、纵火和恐怖威胁等罪名起诉了 44 人，其中包括环境和土著权利维护者。获准出庭作证的证人因法院远离邦县以及缺乏出行所需的资源，难以往法院。被拘留者报告说，他们被剥光衣服、捆绑起来，无法获得饮用水。有些人还报告说遭到殴打，包括用棍棒殴打，导致严重受伤，有些人甚至落下终身残疾。⁵²

78. 2023 年，特别报告员获悉，人权维护者 Alirio Perdomo 险些遇害。Alirio Perdomo 是一名手工渔民，也是哥伦比亚 El Quimbo 水电项目受影响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该协会由当地民众组建，目的是针对 El Quimbo 大坝开发项目，维护自身权利。Perdomo 先生还担任马格达莱纳河 Calandrerros 渔民协会主席，致力于维护受 El Quimbo 项目影响的乌伊拉省渔民的权利。⁵³

79. 根据 2019 年 9 月收到的资料，Perdomo 先生曾向霍沃市有关部门报告称，他和马格达莱纳河 Calandrerros 渔民协会的其他人接到了威胁电话。2023 年 3 月，他据称录制了一段视频，记录据称因 Betania 大坝和 El Quimbo 项目运行而造成的鱼类死亡情况，几个小时后，他遭到两名不明身份人员枪击，耳部受伤。他随后请求国家保护部门采取保护措施，但未被评估为高风险。⁵⁴

80. 一个充分证明在菲律宾农村地区开展工作的许多人权维护者所谓被贴红色标签的案例是：2023 年 7 月，环境维护者 Miguela Peniero 和 Rowena Dasig 在奎松省 Atimonan 的偏远沿海 Caridad Ibaba 社区进行研究时被捕。她们当时正在评估

⁵⁰ 见 CAN 2/2022 号函件。

⁵¹ 见 LBR 1/2023 号函件。

⁵² 同上。

⁵³ 见 COL 5/2023 号函件。

⁵⁴ 同上。

已计划的循环燃气轮机发电项目和液化天然气终端工厂对椰农和渔民健康及当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81. 该地区高度军事化，部分原因是新人民军持续的叛乱行动。士兵们包围了这两名妇女居住的房屋，并在搜查后声称发现了她们拥有的枪支和爆炸物，但两人都予以否认。两人被第 85 步兵营以非法持有枪支和爆炸物的罪名逮捕，最终被转移到卢塞纳市监狱。据说，她们的家人和朋友被禁止向她们提供医疗用品。Peniero 女士此前曾因非法持有武器罪被监禁八年，后又被无罪释放。⁵⁵ 两人被捕后不久，第 85 步兵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其拘留了“恐怖组织新人民军的两名成员”，并称 Peniero 女士曾“领导伏击行动”并策划杀害士兵。⁵⁶

82. 由于媒体和民间社会对农村地区的侵害人权行为缺乏监督，攻击事件完全有可能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发生。Desire Nkurunziza 是乌干达基库贝区 Nyairongo 村的一名环境权利维护者，他主张反对砍伐 Bugoma 中央森林保护区的森林，该保护区被租赁给 Hoima 糖业有限公司，主要用于甘蔗种植。2023 年 7 月，据称有两名男子告诉他，村里的两名村民因进入森林(现已成为甘蔗种植园)而被捕。他同意跟随两人离开，去协助村民。当他们到达时，据说他被转交给 Hoima 糖业有限公司的两名武装人员，后者据称对他进行了殴打，并录制了一段视频，指控他非法砍伐甘蔗。随后，他以“煽动暴力”和“非法侵入”罪名被任意逮捕，并在基库贝警察局被关押了两天，之后获得保释。⁵⁷

83. 特别报告员敦促各国各企业履行义务和责任，保护和尊重所有人权维护者的权利，包括活跃于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以及自愿与世隔绝的人权维护者的权利。

七. 在冲突、冲突后和危机局势中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

84. 特别报告员经常听到在冲突、冲突后或危机局势中工作的人权维护者们谈及因其工作性质而产生的具体挑战。她提到前任特别报告员于 2020 年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其中指出，许多人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因情况所迫或出于必要成为了人权维护者，但由于他们并不正式隶属于某个特定组织或职业，而且又在最偏僻的地区或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开展活动，他们的许多贡献仍然不为人所知。⁵⁸

85. 冲突常常导致战斗地区无法进出，这进一步隔绝了人权维护者与支助网络的联系。

86. 在加沙的持续冲突中，这种情况尤为显著。进出加沙极为困难，网络连接也不稳定。国际保护机制基本上不起作用，未能防止多名人权维护者被杀害。特别

⁵⁵ 见 PHL 5/2023 号函件。

⁵⁶ 见 <https://www.altermidya.net/health-worker-volunteer-arrested-in-quezon> 和 <https://www.facebook.com/Sandiwa85/posts/pfbid025jJa4ktesjqEcgbokNUErz8V6Lp5cFo8AQ5HhoRxsjatNb6Ainpm9yyWdvQ6WnVol> (菲律宾文)。

⁵⁷ 见 UGA 3/2023 号函件。

⁵⁸ [A/HRC/43/51](#)。

报告员赞扬巴勒斯坦的人权维护者，包括记者所做的杰出工作——他们坚持记录侵犯人权行为，并警示世界在保护缺失情况下发生的大量暴行。

87. 苏丹的冲突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报道，在该国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受到骇人听闻的侵犯，却无法诉诸司法。2023 年 10 月，特别报告员就至少七名人权维护者于该年 6 月和 7 月在西达尔富尔州朱奈纳遇害一事向苏丹政府提出关切。⁵⁹ 苏丹问题专家小组在 2024 年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指出，通信网络中断严重妨碍了对快速支援部队空中轰炸下达尔富尔局势的监测。⁶⁰ 据律师 Yousef Mahmoud 称，该地区通讯中断长达数月，南达尔富尔首府尼亚拉陷入犹如中世纪的通信绝境。⁶¹

88. 其他冲突局势中的人权维护者的工作也往往不为国内或国际的广大受众所知，要获得筹集资源所需的必要关注也更为困难。手有玫瑰疏散小组的志愿者们活跃于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致力于从炮火连天的社区营救平民。他们指出，国际观察员出于安全担忧，很少访问该地区。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和当地其他人道主义维护者的工作往往无法见报、不被重视，他们只能自行承担汽油和车辆维修等重要资源的费用。⁶²

89.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资料称，在斯里兰卡受冲突影响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工作的人权维护者面临过度的暴力、监视并被贴上恐怖分子标签，许多妇女人权维护者被标记为反国家分子，在和平抗议活动中遭受暴力、污名化和攻击。⁶³

90. 缅甸一个社区性组织的人权维护者指出了该国东南部持续的冲突下严重的强迫失踪问题。他们在磋商会上交流了该组织的研究人员在确定失踪人员人数方面面临的各种挑战。他们分享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实地研究人员虽然报告了某一地区发生的强迫失踪事件，但由于该区域战事升级、武装团体激增以及记录社区中的侵犯人权行为存在风险，仅对该地区的当地村民进行了两次访谈。

91. 他们进一步强调了当地人权维护者在报告强迫失踪事件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保护方面的不足。这些困难包括担心武装行为体，特别是军政府及其附属势力的报复，以及缺乏追究加害者责任或寻求正义的机制。失踪事件发生后，失踪村民的亲属和社区成员往往被迫逃离，难以跟进事件后续。在寻求正义方面，在缅甸国际组织提供的支助机制未能充分惠及缅甸东南部的受影响者，当地村民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正式支助。

八. 偏远监狱

92. 一些国家出现了一个显著的趋势，即将被监禁的人权维护者关押到远离家乡的监狱中，或严格限制他们与家人和法律团队联系，从而进一步惩罚他们。这种

⁵⁹ 见 SDN 4/2023 号函件。

⁶⁰ S/2024/65, 第 31 和第 32 页。

⁶¹ 见 <https://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war-plunges-south-darfur-communications-into-medieval-abyss>。

⁶² 见人权优先组织提交的材料和 https://humanrightsfirst.org/wp-content/uploads/2024/06/Ukraine-HRD-report_June-2024_final.pdf。

⁶³ 见前线卫士提交的材料。

做法隔绝了他们与支助网络的联系，家人、朋友和支持者要前往探视或仅寄送物资，都会面临安排上和经济上的困难。许多处于这种境况下的人权维护者的家人告诉特别报告员说，这对他们自己和人权维护者的心理健康都有影响。

93. 众所周知，这种做法在中国十分常见。伊力哈木·土赫提自 2014 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他家住北京，被捕前已在北京生活 20 年，而他所在的监狱距离北京 2,700 公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仍住在北京，还有一个女儿流亡美国。他正在服无期徒刑，他的家人自 2017 年以来一直不被允许前往探视。

94. 余文生和许艳被关押在江苏省苏州市，但两人家在北京，两地距离 1,100 公里。两人的儿子(在他们被拘留前不久刚满 18 岁)近年来精神健康状况恶化，而父母被拘禁于离家如此之远的地方，更加剧了他的状况。⁶⁴ 许、余二人均于 2023 年被捕，并于 2024 年 10 月被判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余文生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许艳被判处有期徒刑 21 个月。此前，余文生也曾入狱四年，当时他被关押在同属江苏省的徐州市和南京市，许艳不得不长途跋涉前往探视。

95. 在俄罗斯联邦，许多惩戒设施距离人口居住区很远。例如，臭名昭著的 IK-3 惩戒所位于北极圈内、地处偏远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每次律师前往该地探视都会产生巨额费用，而这一负担完全落在了关押于该监狱的人权维护者的亲属身上。⁶⁵

96. 西撒哈拉人权维护者 Al-Hussein al-Bashir Ibrahim 和 Khatri Dadda 分别被判处 12 年和 20 年监禁，分别于 2023 年和 2022 年从阿伊特迈卢勒监狱转移至萨菲的 Moulay el-Bergui 监狱。转移后，Al-Bashir Ibrahim 先生距离其位于坦坦镇附近的家 600 公里，而 Dadda 先生距离其位于斯马拉的家 850 公里。这一距离导致 Dadda 先生的父母无法前往探视。Al-Bashir 先生曾要求转移到离家较近的监狱，但遭到拒绝。⁶⁶

97. 一些国家将人权维护者单独监禁，完全禁止他们与家人或律师联系，由此进一步孤立他们。

98. Ahmed Mansoor 于 2017 年被捕并被判处 25 年监禁，目前正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服刑。据称，他自 2018 年以来一直被单独监禁于条件恶劣的环境中——牢房面积小，只有 4 平方米，没有床垫，几乎或完全无法获得阳光、淋浴和饮用水、进行锻炼或享有食堂服务，也不能与外界联系。这些条件加重了他的健康问题。⁶⁷

99. Mohammad al-Qahtani 因创建沙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协会，在沙特阿拉伯被判处 10 年监禁，于 2022 年刑满。然而，他并未刑满获释，而是被迫失踪，并被隔离羁押，直至 2024 年才获准与家人进行了一次简短的通话。⁶⁸

⁶⁴ 见 CHN 6/2024 号函件。

⁶⁵ 见 OVD-Info 提交的材料。

⁶⁶ 见 MAR 2/2023 号函件。

⁶⁷ 见 ARE 1/2021 号函件。

⁶⁸ 见 SAU 10/2022 号函件和 <https://alqst.org/en/politicalprisoners/mohammed-al-qahtani>。

九. 自我保护

100. 特别报告员经常听到一些社区在缺乏国家保护的情况下，找到创造性的方法进行自我保护，包括采取集体办法。在哥伦比亚，土著卫队采用非暴力的集体保护方式提供急救，并捍卫土著领地和人民免受武装冲突的影响。他们还帮助寻找失踪人员，解救被绑架者。黑人社区进程是由 140 多个非洲裔实体组成的社会运动，致力于与社区合作共同维护其权利并保护其文化。⁶⁹

101. 哥伦比亚的一名妇女人权维护者表示，组建卫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做法；在她的定义中，卫队负责守护领地、发现陌生人并向人权维护者通报，以及陪同参加公共活动，监测异常动向。她还建议建立集体保护空间，例如社区农场或其他场所。当社区面临威胁时，可以离开其领地并前往这些场所居住数日，待危险解除、恢复安全后再返回家园。⁷⁰

102. 索马里人权维护者联盟特别关注偏僻和农村地区，并报告了保护人权维护者的基层举措。该组织发现，在某些地区，如希兰、邦特兰和朱巴地区以及索马里兰，人权维护者组成了地方网络进行互相保护和资源共享，在政府干预缺位的情况下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和支持。一些在偏远地区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建立了数字通信渠道，包括该联盟设立的热线，用于报告侵权行为以及迅速向同事和合作伙伴发出威胁警报。⁷¹

103. 非政府组织土著人民集体行动指出，在印度尼西亚，一些非政府组织或全国非政府组织联盟在偏远地区设立了报告站或联络点，以方便人权维护者迅速向国内保护性非政府组织报告威胁。⁷²

104. 特别报告员指出，为人权维护者和平倡导他人权利的工作创造安全的环境本是国家应当履行并已承诺履行的职责，现在却必须由人权维护者自己承担。

十. 向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人权维护者提供的支助

105. 一些行为体制定了向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的人权维护者提供支助的方法。

106. 蒙古国的许多人权维护者常驻偏远地区，大多为社区领袖和环境倡导者。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报告称，蒙古是唯一一个制定了保护人权维护者的国家法律的亚洲国家。该组织还报告称，自 2021 年该法律通过以来，人权维护者对法律内容(包括其规定的权利及保护机制的定义)的熟悉程度虽然提升缓慢，但令人鼓舞。推动该法全面有效实施固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蒙古的案例凸显了国家保护机制的重要性。⁷³

⁶⁹ 见大学反腐败网络提交的材料。

⁷⁰ 见 Marylen Serna Salinas 与国际保护组织提交的材料。

⁷¹ 见索马里人权维护者联盟提交的材料。

⁷² 见土著人民集体行动提交的材料。

⁷³ 见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提交的材料。

107. 如特别报告员 2021 年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所记录，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建立了由政府主导的人权维护者保护机制，成功程度各异。⁷⁴ 她指出，这些保护机制在实践中往往不如理论上完善，偏僻、边远和农村地区的人权维护者即便被纳入了国家保护措施，也仍然继续遭到谋杀和身体攻击。她经常收到来自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以及其他设有保护机制的国家的人权维护者面临危险的报告。

108. 在最需要保护的偏远地区，人们对保护机制的认识也往往匮乏。秘鲁设有规程和机制以应对人权维护者面临攻击的情况，但当地非政府组织表示，警方并不熟悉该规程和该机制，而且由于距离遥远或缺乏通信系统，警方在后勤安排上也受到限制，不一定能够前往受害者所在的地点。⁷⁵

109. 其他行为体也对偏僻、边远或农村的人权维护者面临的挑战做出了响应。巴西潘塔纳尔湿地的农村人权维护者正在使用数字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即便在网络连接不稳定或带宽较低的条件下也能正常运行，能够保障数据安全且广泛可用。这些人权维护者利用所收集的资料反击气候变化否定论，并在政府无视野火蔓延的证据时，建立了可信的环境影响记录。⁷⁶

110. 挪威人权基金报告称，其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合作伙伴组织——由土著青年主导的非政府环保组织指南针护林基金会，利用无人机技术和卫星影像帮助当地土著社区记录和申报传统土地和森林地位。他们将数据共享给地方监察员办公室、地方税务部门以及其他地方政府机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该地区 70 家采石企业和 14 家棕榈油企业受到了逃税调查。当地税务部门估计，该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数据将帮助追回约 6,800 亿印尼盾(约合 4,631 万美元)的补缴税款。此外，该组织拍摄的无人机影像和卫星图片还记录了这些企业非法侵占土著人民土地和森林并向地方政府隐瞒这一事实的情况。⁷⁷

十一. 结论和建议

111. 多国政府未能履行保护人权维护者，包括偏僻、边远和农村地区人权维护者的道德和法律义务。特别报告员理解，保护在此类情境中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确有实际的困难，但保护不到位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政治意愿。无论人权维护者在何处开展工作，各国都能够且应当予以保护。

A. 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

- (a) 公开宣传在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工作的人权维护者所做的拯救生命的工作；
- (b) 加强首都以外的支助网络，主动接触在农村地区工作的人权维护者；

⁷⁴ [A/HRC/46/35](#).

⁷⁵ 见法律、环境和自然资源协会提交的材料。

⁷⁶ 见斯特林实验室提交的材料。

⁷⁷ 见挪威人权基金提交的材料。

(c) 视必要加强并扩大现有保护网络，确保覆盖到偏僻、边远和农村地区的人权维护者，并在尚未建立保护机制的地方设立此类机制；

(d) 支持建立社区支助网络和预警系统；

(e) 普及网络覆盖，推广安全通信工具，包括增加对加密通信应用程序和安全报告渠道等数字安全资源的供资；

(f) 支持能够帮助人权维护者安全存储和保护信息而不必担心非法监视或数据泄露的努力，包括制定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以防止数字工具被滥用于压制异见或攻击人权维护者，并确保其数字权利得到保护；

(g) 指示使馆和使团探访偏远地区的人权维护者，而不仅限于大城市，以更好地了解具体的需求，促进真正的合作，包括在安全和资金需求方面；

(h) 为在冲突地区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建立安全通道，便利其行动；

(i) 以更集体化的视角开展保护工作，包括加强基层组织和网络的能力；

(j) 为环境人权维护者建立保护机制，同时考虑到针对妇女和女童人权维护者、土著人民以及农村和边缘化社区的侵权行为的交叉层面；

(k) 采取公共政策，保护在安全有利环境中维护人权的权利，同时考虑到偏远和农村地区人权维护者的多样性，包括妇女、儿童和青年、LGBTQI+ 人士、土著人民、非洲人后裔、农村居民和残疾人；

(l) 向特别报告员发出公开邀请，允许特别报告员按意愿开展访问，不限制时间或范围，并确保她能够在首都以外各地自由移动，特别是在幅员辽阔的国家，以便她能够前往偏远地区会见无法出行的人权维护者；

(m) 制定法律，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设立或经营的企业持续开展人权和环境尽责工作，包括评估人权维护者面临的风险；

(n) 确保在所有适用情况下尊重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权利，并遵循由社区制定的协商模式；

(o) 支持能力建设和技能发展，帮助人权维护者更好地保护自己。

B. 企业应：

(a) 根据《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对一切形式报复就其项目或业务提出人权或环境关切的个人、团体或社区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

(b) 确保在所有适用情况下尊重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权利，并遵循由社区制定的协商模式。

C. 民间社会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应：

制定战略并增加资源，确保其工作能够覆盖偏僻、边远或农村地区的人权维护者，包括邀请他们，特别是妇女人权维护者参加活动、培训课程和磋商会，并与他们建立可信的通信方式，帮助他们报告权利遭受侵犯的情况。